



论意大利 最古老的智慧

——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

[意] 维柯 著 张小勇 译



上海三联书店

论意大利 最古老的智慧

——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

[意] 维柯 著 张小勇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意)
维柯著；张小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4
(思想与社会)

ISBN 7-5426-2286-2

I. 论... II. ①维...②张... III. ①拉丁语-词源
学-研究②哲学史-研究-意大利 IV. ①H771.3②
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6677 号

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

著 者 / [意]维柯

译 者 / 张小勇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王晓阳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90 千字

印 张 / 12.75

ISBN 7-5426-2286-2

G·143 定价:22.00 元

总 序

λόγος 和 πόλις 是古代希腊人理解人的自然的两个出发点。人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在共同体中,人不仅能活下来,还能活得好;而在所有共同体中,城邦最重要,因为城邦规定的不是一时的好处,而是人整个生活的好坏;人只有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成全人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政治的动物。然而,所有人天性上都想要知道,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人要活得好,不仅要过得好,还要看到这种好;人要知道他的生活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要讲出好的道理;于是,政治共同体对人的整个生活的规定,必然指向这种生活方式的根基和目的,要求理解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秩序的本原。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讲理的动物。自从古代希腊以来,人生活的基本共同体经历了从“城邦”(πόλις)到“社会”(societas)与现代“国家”(stato)的不同形式;伴随这种转变,人理解和表达自身生活的理性也先后面对“自然”(φύσις)、“上帝”(deus)与“我思”(cogito)的不同困难。然而,思想与社会,作为人的根本处境的双重规定,始终是人的幸福生活不可逃避的问题。

不过,在希腊人看来,人的这种命运,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野蛮人,不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说话,讲不出他们生活的道理。政治和理性作为人的处境的双重规定,通过特殊的政治生活与其道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微妙张力,恰恰构成了西方传统的根本动力,是西方的历史命运。当西方的历史命运成为现代性的传统,这个共同体为自己生活讲出的道理,逐渐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在它的道理面前衡量他们生活的好坏。幻想包容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思想,注定是越来越少的生活。在将越来越多的生活变

成尾随者时，自身也成了尾随者。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在思想和社会上，面临着摧毁自身传统的危险。现代中国在思想和社会上的困境，正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的处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渗透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中的这一西方历史命运。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担负着西方历史命运的外来危险和自身历史传统的内在困难。一旦我们惧怕正视自己的命运带来的不安，到别人的命运中去寻求安全，或者当我们躲进自己的历史，回避我们的现在要面对的危险，听不见自己传统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我们手中，两个传统就同时荒废了。社会敌视思想，思想藐视社会，好还是不好，成了我们活着无法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尾随西方的历史命运，让它成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让它成为我们造就自己历史命运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想窒息自身的历史传统，让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借助另一个传统，思考我们自身的困难，面对我们现在的危机，从而造就中国人的历史命运。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这个社会的生活之中仍然活着的，仍然说话的传统。《思想与社会》丛书的使命，就是召唤我们的两个传统，让它们重新开口说话，用我们的话来说，面对我们说话，为我们说话。传统是希腊的鬼魂，要靠活的血来喂养，才能说话。否则海伦的美也不过是沉默的幻影。而中国思想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血气，滋养我们的传统，让它们重新讲出我们生活的道理。“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只有日新的传统，才有止于至善的生活。《思想与社会》丛书，是正在形成的现代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它要造就活的思想，和活着的中国人一起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译者导言

〔概要介绍〕

加姆巴蒂斯达·维柯(1668—1744)是近代意大利最伟大的民族哲学家。随着维柯著作的各种译本的问世,人们逐渐承认,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历史学、语文学、法学、美学、教育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凡的开拓创新,而且有很多思想至今仍然在等待着我们消化。维柯最伟大的代表作就是《新科学》,该书共有三个版本。第一版《关于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诸原则》,凭借这门新科学就可以发现民族自然法的新体系的诸原则》发表于1725年;第二版《维柯关于各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学的诸原则》,书五卷》发表于1730年。两个版本差别甚大,宛如两部书。第三版《维柯关于各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学的诸原则》在维柯去世同年,即1744年出版。该书是后人根据维柯对第二版《新科学》增删修订的手稿本整理出版的。这三版《新科学》都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这是维柯对母语意大利语的伟大贡献。但我们要说,他首先还是一位拉丁作家。他在《新科学》之前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都是用拉丁语写成的,包括《六次大学开学典礼演讲》(1699—1707)、《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第七演讲,1708)、《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1710)、《安东尼奥·卡拉法生平》,书四卷》(1716)、《普遍法》(1720—1722)等。即使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新科学》,不仅在内容上很大一部分就是拉丁语文学,而且维柯的意大利语本身也经常要从拉丁词源上来理解。而维柯的拉丁语文学研究正是从《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开始的。

《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以下简称《古代智慧》)是维柯生平

第一部专著。此前的七次大学开学典礼演讲都是出于职责而为。其中只有第七演讲《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在本书出版的前一年出了单行本。另外正如维柯所说,本文是为学者而作,此前人文演讲的对象则是青年学子。维柯本来计划要写三部书,但在出版了第一部也就是《形而上学》之后,这项工作就再没有完成。关于第二部也就是《物理学》部分,维柯仅仅有了一个思想草图,后来在1713年出了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论生物体的平衡》(*De aequilibrio corporis animantis*)。而第三部即《伦理学》只是一个设想,从来没有写出过。本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夏秋之际,威尼斯的《意大利学人报》(*Giornale de' Letterati d'Italia*, tomo V, art. VI, PP. 119—130)刊登了一篇针对《古代智慧》的匿名评论。维柯于当年9月份对该评论作了公开答复并出版,此即本书中的第一答复。看到维柯的答复之后,那位匿名评论者又对该答复作了回应,刊登于同年同一期刊上(*Giornale de' Letterati d'Italia*, tomo VIII, art. X, PP. 309—338)。次年9月,维柯写下了本书中的第二个答复,并迅速出版。最后该期刊以一个简单声明结束了这场争论。本书正文的原文为拉丁文,两篇答复的原文均为意大利文。

正如维柯在其《自传》中所述,本书的创作动机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培根的《论古代智慧》和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激发了维柯,使他去寻找比诗人的神话故事更早的关于古人智慧的一些起源,同时也给他提供了范例;其二是维柯对过去语法学家的词源解释并不满意,因而他要亲自去钻研拉丁文字的起源,以此寻求关于古人智慧的一些原则。^①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动机人们尚未注意,即维柯在这本书中还想确立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他在《自传》中曾说,该书实际上是要为他的物理学奠定基础。^②正因此,我们看到维柯的第二部书就是物理学,第三部才是伦理学。

① 参见维柯《自传》,《新科学》1744年版,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77页。

② 同上第680页。

有学者认为,仅仅从维柯的动机来看,他就已经让自己陷入了一种他后来所批评的“学者的虚骄”,即一方面他要探讨的是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种哲学必然是一种玄奥智慧,另一方面他又要通过语文学证明,这种智慧也是意大利人最古老的智慧,但这种智慧如果按照《新科学》的维柯来看,必然是一种诗性智慧。正因此,《新科学》的维柯对于《古代智慧》的探索有所贬低。

也因为这个原因,有些维柯哲学史研究家认为《古代智慧》是毫无价值的,在维柯思想发展史上并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当然反对者可以说,维柯正是从这里才发展出了《新科学》的根本原则,那就是真理与创造相一致;也正因此,后来维柯才能断定人类历史有其真理和确定性。但是那些研究家们又反驳说,维柯后来已经说明,各项人类事务的秩序比之几何中的点、线、面具有更高的现实性,因为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而点和数只是人类心灵的虚构。因此,历史实践世界比之于抽象的形式世界更加确实。故而,既然有了《新科学》时期的真理与创造相一致的原则,就没必要再去看《古代智慧》时期的真理与创造原则了。因此,他们否认这个原则为后来的《新科学》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③无可否认,在《新科学》时期,维柯的这个原则获得了更高更新的含义,而且,如果《古代智慧》时期的真理与创造原则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的话,的确不可能作为《新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但是,从思想发展史角度来看,后来的真理与创造的原则必然是从这里发端的,正是在这里维柯完成了他的思想中的第一个突变,有了这个突变

③ 这种观点首先是由克罗齐的一个学生坎托尼(Carlo Cantoni)在1867年提出的,参见他的《维柯》(G. B. Vico, Turin: Civelli, 1867)。穆尼(Michel Mooney)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修辞传统上来看维柯,他在他的《维柯在修辞学传统中》(*Vico in the tradition of Rhetoric*)认为,维柯的《古代智慧》只不过是“从一大堆资料中抽引出来的充满想象和迷人的各种观点的大杂烩,其目的就在于服务于一种完结的形而上学”。扎伽林在他的《对维柯知识理论的一个批评》(“Vico's Theory of Knowledge: A Critique”, i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34[1984]: 15—30)一文间接地说,《古代智慧》中的真理与创造原则与理解维柯的《新科学》毫无关系。因而《古代智慧》只是维柯思想的一个无用的注释。

才可能有《新科学》的突变。^④而且,《古代智慧》时期的突变是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和认识论哲学发展的直接结果,研究这个时期的真理与创造原则能使我们看到维柯对于近代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有什么样的看法,采取了何等不同的思想路线,而这个角度却是《新科学》时期的真理与创造原则所忽略的。

然而,即使是上述的第一个弊端,我们也认为它不仅不是缺点,反而是维柯最为独特的创造。因为探究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竟然可以用语文学方法来进行,这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别是对于笛卡尔之后的近代哲学来说,那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后来的哲学家们之所以很难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忽视了古典传统,从思维到思维来构造哲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一个哲学和语文学相互分裂的时代,要同时具有精深的哲学素养和扎实的语文学功底,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外,本书中的形而上学探索又要求对于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有相当程度的熟悉和掌握。仅仅掌握这三样知识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更不用说维柯还要将这三样东西融会贯通。不仅如此,对于这样精深广博的智慧探索,维柯将其容纳在其正文还不到四万字的一本小书中。无论维柯在本书中的探索是否成功——成功与否读者自有判断——这已经是一项伟大的创造。

④ 这里的观点与上述相反,是由德国的奥托(S. Otto)和维赫特巴乌尔(Helmut Viechtbauer)首先提出的,参见奥托和维赫特巴乌尔译《古代智慧》(*Liber Metaphysicus. Risposte*, Munich: Wilhelm Fink Verlag, 1979)以及维赫特巴乌尔的 *Transzendente Einsicht und Theorie der Geschichte. Überlegungen zu G. Vico's "Liber Metaphysicus"* (Munich: Wilhelm Fink Verlag, 1977)。他们认为《古代智慧》在维柯思想的发展中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巴达洛尼在他的《维柯评介》(*Introduzioni a Vico*, Bari: Laterza, 1984)中也认为,如果没有《古代智慧》,维柯的《新科学》就是缺乏基础的。克罗齐在《维柯的哲学》(*La filosofia di Giambattista Vico*)、金蒂莱在《维柯研究》(*Studi Vichiani*)、尼克里尼在《维柯评论》(*Saggi Vichiani*)中都认为,《古代智慧》代表着维柯思想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后来又在《新科学》中得到了修正和转变。这种历史观点最后得到了费希的小心支持,他在《维柯和实用主义》("Vico and Pragmatism", in *Giambattista Vico: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pp. 401-24)中把《古代智慧》看作是维柯的唯名论思想,到《新科学》转变为唯实论。

而且,正是维柯在这部书中的语文学探索,才促使他按照新的原则来探讨人类古代智慧。这种新的原则就是真理与创造之间相互转化。从真理与创造这个真理标准出发,维柯就有可能给“原则”找到一个新的定义,那就是原则不仅意味着一种永恒的形式,而且还意味着一样事物的真正起源。前者作为一种起源存在于形而上学之中,最终存在于上帝之内;后者作为一种起源存在于历史之中,必须由语文学来加以揭示,这种语文学的原则就是:“语词要按照它们的本来含义来解释。”这预示着后来在《新科学》中的一条基本原理,即哲学必须和语文学相结合,真理必须和确定相结合,理性必须和权威相结合,这些原则在《普遍法》中已经提出来了。

即使这里探索的智慧还不是真正的最古老的智慧——按照《新科学》,最古老的智慧实际上是感性的诗性智慧——然而却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哲学智慧,或者说最古老的形而上学智慧。如果说有很多哲学家都把自己的形而上学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真理,并且因而把他们的真理看作是古人也必然拥有的真理,那么维柯的研究方法不仅从根本上来说就已经否定了这种学术态度,而且从本书的真理与创造相互一致的原则必然还要衍生出一种新的科学态度。因为既然真理必须创造出来才是真理,那就必须看看人类是如何在历史中创造出这些真理来的。科学与历史、古代与现代的交锋在维柯的《研究方法》中就已经开始,而本书则提供了解决这场冲突的根本手段。此外,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本书的思想还是希腊智慧和罗马智慧的交锋,因为维柯是要从拉丁语源而不是希腊语源来寻求最古老的智慧;他要寻求的是最古老的意大利智慧,而不是最古老的希腊智慧。在《新科学》中维柯同样更欣赏拉丁智慧,他对于人类自然法的探索更多的是来自于意大利民族,在语文学上拉丁语更是功不可没。维柯在第二答复的末尾说,哲学对于世界的作用就在于创造各个民族。也许维柯本书的目的还在于通过重新发现意大利的辉煌历史和民族精神,来重新塑造意大利的光辉未来。

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

[维柯形而上学的来源]

毫无疑问,根据维柯这本书的核心诉求,即从拉丁语源发掘出来的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那么本书中的形而上学观念必然要以拉丁语源为依归。除了拉丁语文学资源之外,很明显,维柯借取了一个二合一的伪芝诺的点的学说,这是维柯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⑤借取了毕达哥拉斯的数的学说,这和芝诺的点具有相同的本性;借取了经过新柏拉图主义改造的柏拉图的概念论,这种观念作为心灵的形式优于亚里士多德的共相;他还借取了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作为一切形式的形式,作为真理的最终源泉和绝对标准——上帝产生和创造宇宙万物,人则创造属于人类心灵和精神的东西。此外,他又运用了经院哲学的术语,保留着很多经院哲学思维的痕迹。从这些古代哲学中维柯提出的主要问题是:物理形体怎么可能由几何学的点来构成?“因为说形体由几何学的点构成,等于就是说一个现实事物是由抽象事物构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用以反对芝诺的形而上学的点的。与此类似的问题就是毕达哥拉斯的数的问题,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是由数目构成的,但这个观点是违反常识的。维柯要思考的就是如何才能使这两个问题能够得到合理的理解。笛卡尔简单地把这些观念看作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纯粹形式,这个论断的真理性一方面是由心灵的清晰分明的标准,另一方面是由不欺骗人的上帝来保证的。然而这三个基本观点都是维柯所不能接受的。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为什么维柯从所有古代思想资源中单单取出了这些资源,把它们作为他的形而上学或者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呢?其实,维柯借取这些资源并非偶然;相反,可以说这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而《蒂迈欧篇》中主要倡导的就是主张世界是由数目和形式构成的毕达哥拉斯主义。无论是偏向于数学模型的开普勒和笛卡尔,还是重视实验—数学方法的伽利略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集大成者牛顿,

^⑤ 关于这个伪芝诺,参见正文注释 71 和 82。

其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种毕达哥拉斯主义。因此,维柯所引述的古代思想其实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共同来源。从这一点来说,维柯在《古代智慧》一书中明确揭示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根源。他敏锐地看到柏拉图的物理学优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关键所在,而这个关键就包含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当中。因此,尽管维柯说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是他的《古代智慧》的蓝本,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形式上的蓝本,其思想上的蓝本则是《蒂迈欧篇》。影响维柯思想的新柏拉图主义与这种思想传统也密不可分。维柯曾在《自传》中对这种柏拉图的观念论作了描述,那就是观念就像种子一样产生出一切形式,这种观念是能动的个别形式,作为能动的个别形式能够产生一系列其他的形式;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却是僵死的普遍共相,人们只是在比较和区分中才对其有所把握。在这两者之间,近代自然科学确实是倾向于前者而贬斥后者的,即使是维柯所批判的笛卡尔,也否定亚里士多德的本原论。^⑥不过,维柯仍然批评笛卡尔犯了与亚里士多德相同的错误。这又是为什么呢?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再仔细看看,维柯在近代思想资源中选取了谁。近代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虽然都遵循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路线,然而具体道路仍然是有所差异的。其中一条路线就是偏向数学或纯粹数学的路线,他们相信点和数就是万物宇宙的根本法则,是上帝赋予宇宙的神圣属性。这条路线在主要依靠几何学的时代以开普勒为代表,在分析几何出现后当然是以笛卡尔为代表,因为笛卡尔正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另外一条路线同样重视数学,然而也同等地重视实验和观察,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数学—实验方法。而真正代表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的正是后者。对于维柯来说,其代表就是伽利略。意大利的几大学院基本上都承袭了伽利略的衣钵,其中就包括创建在那不勒斯的“因韦斯蒂甘第学院”。正如维柯在本书中所概括的,这种方法的真理本性就是通过数学—实验做成既与思想相似,又与自然的作品相似。因此,在自然科学方法

⑥ 参见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一版,附录一,第73页。

上维柯是重视伽利略轻视笛卡尔的。按照维柯的设想,笛卡尔的分析方法和演绎方法应该从属于伽利略的归纳方法和综合方法,我们可以说那就是牛顿的“归纳演绎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实验观察和数学演绎的紧密结合。但是,两条路线都分享了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自然的数学化,这个特征最早则可以追溯到芝诺和毕达哥拉斯那里。因此,维柯和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们一样,都把数学知识当作最确实的知识。即使在《新科学》中,维柯也并没有完全否认数学真理在知识上的最高等级。反对者可能会引证《新科学》1744年版第349段来证明维柯认为历史知识和历史真理高于几何知识和几何真理。然而,维柯在那里说的是,如果谁创造历史就由谁来叙述历史,那么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这种情形正像几何学的情形,因为人们为自己创造出了历史世界。下面一句是重点:“但关于人类事务的各项秩序比起点、线、面来说具有多高的现实性(realtà),那么这门科学也就比几何学具有多高的现实性。”但要注意的是,维柯这里用的词是 *realtà*,也就是现实性,而不是 *certo*(确实、确定)或者 *vero*(真实、真理)。从《新科学》的写作方式上来看,维柯显然也采取了上述归纳演绎的自然科学方法,比如他先列出关于人类历史的相关材料,然后再采用类似于几何学论证的方式对其进行批判分析,归纳出人类历史的科学原则。而且,在数学知识中无须神意的作用,但在人类历史的各项制度和原理中却必然要存在神意的指引。因此,维柯首先必须为数学真理找到一个确实的基础,其前提也就是找到数学知识的本性和起源。这是笛卡尔和维柯的形而上学的共同问题。此外,维柯还想确定自然知识特别是物理学知识的真理本性和确实基础,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自然的数学化如何可能?这个问题就对应于上述那个古代问题,即现实事物如何由抽象事物构成。维柯和笛卡尔所面对的共同问题还包括对抗怀疑论,这就要求他们探索真理的本性和知识的确定性。

17世纪和18世纪初是一个产生伟大体系的时代,无论是形而上学的体系还是物理学的体系。但随着人类知识的巨大进步,同时也产生了

新的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例如科尔内利·阿戈利帕(Cornelio Agrippa)于1527年在纵览了人类知识的各领域之后,宣称人类智慧具有不确定性和空虚性。他的《关于知识和艺术的不确定性和空虚性的断言》(*Declamatio de Incertudine et Vanitate Scientiarum et Artium*)到了18世纪中叶仍然重版印刷且被广泛讨论。弗朗西斯·桑切兹(Francisco Sanchez)宣称人们一无所知,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也提出了一个令人绝望的问题,即由于我们缺乏真正的存在,因而我们缺乏确实的知识。培根的《学术的进步》(*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1623)、笛卡尔的《方法谈》(*Discours de la méthode*, 1637)和维柯的《古代智慧》都是为此而来。^⑦ 共同对抗怀疑论,寻找人类知识的确实性,这是17世纪遗留给18世纪启蒙运动的伟大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智慧》就如一颗明珠镶嵌在这幅伟大的画卷之中了。在笛卡尔出版了他的《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二版(1642)年之后,欧洲兴起了一股笛卡尔潮流,认为笛卡尔用三根支柱解决了新的科学体系的一切困难和一切伦理难题,这就是上帝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和支撑者的存在证明、把物质定义为纯粹的广延以及把心灵看作是纯粹的思想。^⑧ 但同时,欧洲从法国到英国到德国以及意大利的另外一些学者都开始批判笛卡尔的这种认识论,认为知识的确定性问题的确悬而未决,而且怀疑论还蔓延到了新物理学之中,侵蚀着整个人类知识各个领域。最后,培尔(Pierre Bayle)于18世纪初年出版了他的伟大的 *Summa Sceptica* 以及《历史和批判辞典》(*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彻底打碎了同时代人的哲学迷梦。^⑨

因此,对于维柯来说就有双重任务,即在反对怀疑论的同时又要拒斥笛卡尔的独断论,正如本书第一章第三、四节的标题所显示的。

⑦ *On the most ancient wisdom of the Italian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L. M. Palmer, pp. 2-3.

⑧ 同上第4页。

⑨ 同上第6页。

对于维柯来说,伽桑迪和霍布斯对笛卡尔的批判似乎都没有击中要害,也无助于认识人的心灵和精神本身,从这个意义上维柯更接近笛卡尔而不是伽桑迪或霍布斯;马勒布朗士和莱布尼茨的批判只是在枝节和局部问题上比较成功,但并未解决其中的根本问题;英国经验论也很难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代替笛卡尔的哲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维柯所欣赏的培根也不足以担此重任。可以说,当时完全反对笛卡尔体系的人根本不理解笛卡尔的思想,对他的思想稍有理解的人大多比较赞同,理解精深的人则力求找出新的方法和新的批判方法来解决笛卡尔理论内部的不一致性。在笛卡尔体系中主要有两个支点,其一是他的真理标准,即心灵中清晰分明的观念;其二是形而上学与物理学或者心灵与肉体的二元论。据学者们称,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布朗士抛弃了第二点而赞同第一点,而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赞同第二点而抛弃第一点。前者是理性主义者,后者则是经验主义者。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柯对两条路线都进行了批判,因而既没有成为经验主义者也没有成为理性主义者。^⑩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大部分思想体系或多或少都融入到这本小册子中了,都对本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在我们可以预先提出我们的观点,即上述两条路线其实都遵循了笛卡尔所规定的道路:人作为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旁观者把全部世界作为客体来进行反思。而维柯的认识论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人在认识内部世界的同时就创造了内部世界,然后用内部世界来创造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关于这个观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详细的讨论。我们接着要说明的是,维柯的形而上学也是他本身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这和我们上文已经提示的一个结论相关:这种形而上学也是《新科学》的逻辑前提。关于这个结论我们将在最后予以阐明。

尽管在维柯的早期大学开学典礼演讲中关注的是人文教育这个

^⑩ *On the most ancient wisdom of the Italian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L. M. Palmer, p. 12.

主题,但其中发展出来的一些基本原则却或间接或直接地导向《古代智慧》的形而上学原则,乃至《普遍法》的法哲学原则和《新科学》的人类历史原则。前面六个人文演讲发展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包括人性原则、公民原则、整体智慧原则和人类个体的发育次序原则。其中整体智慧原则要求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公民都要利用人类智慧的所有方面全面培养语言、心灵和精神的各種能力,改正这三个方面的墮落本性。因此,这个原则实际上要求的是用整体的智慧来培养整体的人和整体的公民。从这方面来讲,智慧就包括雄辯、知识和审慎,分别培育人的语言、心灵和精神。人类个体的发育次序原则就是,学习研究的各项目的和各项内容必须从人类个体不同发育阶段的不同自然本性出发来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个体的精神教育必须分为三个阶段,即儿童时期、青少年时期和成人时期,在三个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目的,例如儿童时期主要学习语言和历史,青少年时期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然后通过审慎智慧和雄辯术的培养逐步过渡到成人阶段,最终成为真正的人和真正的公民。前面三个原则就这样融会在第四个原则之中了。由此教育的两个基本要素可以归结为:智慧教育和德性教育。此外,我们还可以加上第五个原则,即创造力,不过这个原则虽然在第一演讲中就已经出现——在那里维柯也曾经把人类心灵的各种能力放在创造这个层面上——但却在《研究方法》中才成为一个根本原则。正是从这些原则出发,维柯在《研究方法》中开始对笛卡尔的方法论进行全面的批判,进而在《古代智慧》中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进行深入批判,并在批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因为,根据上述五个原则,维柯必然要从古代和现代的研究方法的优劣这个角度,来考察人类知识和艺术的一切方面,利用人类智慧的整体来培养公民各方面的能力,以完善和发展人类的自然本性,极大地造福于人类社会。这就是第七演讲《研究方法》的主题。整个演讲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其根本问题就是,要在一切艺术科学门类中探讨人类认识的本性、价值、能力和界限。这个态度也是《古代智慧》的态度。维柯反对怀疑论和独断论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这可以和后来

康德的人类能力划界问题相比。第七演讲和本书都是反对和批判笛卡尔主义的。如果说《研究方法》是站在人类教育角度对笛卡尔主义的方法批判,那么《古代智慧》就是从形而上学角度对笛卡尔主义的真理批判、知识批判和能力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维柯在批判笛卡尔主义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拒斥笛卡尔主义,而是要给笛卡尔的方法划定界限,纠正它的缺陷,并防止人们对它的滥用。

对于本书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维柯对于笛卡尔几何学和物理学的批判。他批判笛卡尔物理学和几何学主要根据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教育学上看,笛卡尔用分析法或者代数学教授几何学、用几何学来教授物理学,都遏制了人类创造力,压制了人类创新精神;另一方面,从真理观上来看,针对笛卡尔的形式主义把仅具有真似性的物理真理看作是绝对真理。维柯在几何学和物理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他那有名的论断:“我们能明证几何[真理],因为我们创造了它们;而如果说我们能够明证物理[真理],那就是我们曾创造了它们。”^①这个原则可以说是《研究方法》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论述,也正是本书中真理与创造原则的先决条件,并在本书第七章末尾加以引用。下面这段话同样也是本书中的重要原则:“所谓真正的事物形式只存在于唯一的至大至善的上帝中,自然就是依据这些事物的形式而形成。因此我们只是像哲学家一样去研究物理学,实际上也就是构造我们的精神。”^②笛卡尔主义忽视综合法偏重分析法,忽视实验经验偏重理性思维,忽视归纳偏重演绎,这些都是与物理真理的本性和人类精神的本性不相符的。所以,应该在辨明真理本性的基础上,以培养创造理性为目的,通过形式、通过综合法来学习几何学,这是对于几何学弊端的补救;在物理学中,代数方法要以几何方法为中介,要重视实验方法和综合方法,要注意培养创造力,这是最好的补救方法。而最后,政治哲学则是对于科学技术的补救。

① 《维柯论人文教育》,维柯著,张小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131页。

② 同上,第131页。